

XIAN DAI

XIAN DAI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现代叙事与文学想象

XIAN DAI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叶诚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XIAN DAI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XIAN DAI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现代叙事与文学想象

XIAN DAI XU SHI YU WEN XUE XIANG XIANG

叶诚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叙事与文学想象/叶诚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6865-4

I. 现… II. 叶…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②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736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现代叙事与文学想象

叶诚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印张 9.625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865-4 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性: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	1
一、现代性一般界说	2
二、作为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7
三、作为文学想象的现代性	13
第二章 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发生与命名	22
一、小说界革命: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事件	22
二、民初小说:传统抑或现代	33
三、小说现代性命名的审美视域	46
第三章 启蒙叙事与小说新伦理	56
一、从“理性”到“疯狂”	58
二、人的解放:在个人与历史之间	73
三、焦虑:启蒙话语的情感特征	112
第四章 审美现代性:在小说“元叙事”之外	139
一、救赎与皈依	141
二、都市“恶之花”与城市“文明病”	168
三、历史与人生的诗境	179
第五章 结语:构筑现代小说与文学史研究的新论域	198

附录:

概述现代文学转型中作家群落的精神面向	236
清末民初文学群落中的新旧互渗	236

新诗流派中的群落标志及其不同面向·····	242
文学群落建构中的文化情怀·····	252
文学视野中的丰子恺·····	261
鲁迅文学世界中的有情诗语与别样词章·····	269
序幕与尾声:少年诗意·暮年怀抱·····	270
呐喊与彷徨:英雄本色·深广忧愤·····	274
讽世与述怀:横眉冷对·怜子重情·····	281
爱憎与忧思:君子离情·乱世冷眼·····	291
后记·····	304

第一章 现代性：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

现代性问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界逐渐展开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出现的现代性首先是某种文化反思的结果，反思的对象正是至迟自启蒙运动以来有关“现代”的历史演进与话语建构，而这一反思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又往往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特殊阶段或一种特殊形态。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理论”主要阐释者的后现代主义恰恰再次体现出现代性内部的结构张力和自我质疑的可能，因此，用“现代性问题”来指称这新一轮文化思潮的内涵也许更加恰当。现代性从一种神圣的文化理念和势不可挡的历史实践活动一变而成为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虽然迄今为止，人们尚未看到一个完整有序的理论新景观，甚至连关键词“现代性”本身也尚在进一步梳理当中，但一系列富有新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解构”与“重建”的开阔论域中得到凸显并期待着各种新的理解。本文即以“现代性问题”这一特定视角面对中国现代小说，力图将在现代文学中历来被视为价值终点的“现代性”重新拉回阐释的起点，以见出中国现代小说这一习见对象的某些新内涵以及“现代性”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复杂性。

一、现代性一般界说

在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中,“现代性”可谓是一个使用频繁而又充满歧义的语词。人们既可以从现代性的起源与发生、演化和变异这一历时的过程来展开讨论,同时也可以从哲学、社会学、宗教、美学以及文化理论等不同层面言说现代性。正像学界所普遍认同的,现代性的近因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左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发生在欧洲的那一历史时段以后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既为传统社会步入“现代”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标志,也为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本身提供了从精神观念、思维方法到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全方位的基础与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启蒙运动尤其被视为现代性生长的一大成因。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说:“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十七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①当然现代性的成因还可以远溯至中世纪后期神学。实际上,在更早的基督教教义中,一种与“现代时间观”(即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相一致的末日审判说就已经潜伏着现代性理念的种子。“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之五面》中曾经详细地叙述现代概念的起源,他认为现代性的观念虽然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但这个概念却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所隐含的时间意识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②“耶鲁大学的一位宗教哲学教授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e)却将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了十四世纪后期。他所谓的现代

①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

性与人们对自然的理解相关。在他看来,中世纪后期神学的各种思潮以及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摧毁了将宇宙、人和超验因素结合起来的传统综合。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通过史无前例地对人的创造力的强调,改变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人变成了意义的唯一来源,而自然——无所不包的自然,则降低为客体,故而,超验性从超自然领域分离了出来。其后,巴洛克文化虽然做了统一的尝试,但分崩离析的局面已成为无法挽回的现实。因此,就西方文化而言,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种子。”^① 尽管对现代性的起源还可以进行更深远的追溯,甚至可以将现代性论争与对柏拉图理想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德行论传统的不同理解相关联^②,但一般而言,人们还是可以大体上将文艺复兴作为考辨现代性的一个相对确定的起点。随着现代性在历史实践层面的持续展开,现代性价值自身的矛盾与变异也开始逐渐生成和强化,由此人们又可以将现代性的流变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现代性大体上可指汉语语境中的近代西方历史与文化,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后期现代性则对应于汉语语境中的现代西方社会,即十九世纪末以后的西方世界。需要辨明的是,无论现代性的近代时期还是现代阶段,在英语中都被表述为 modern,所以 modern(现代)集汉语中“近代”与“现代”二词于一身,modernity(现代性)也就包含了近代与现代的两重属性与内涵。进一步而言,现代性的前后两段的确有不同的历史取向与文化特质,“现代性在这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近代阶段和从十九世纪末以后的现代阶段。两个阶段的特点相当明晰,在现代性的近代阶段,科学、哲学、文艺与新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①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② 余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济、军事一样,都具有一种西方独尊的对非西方的傲气。而现代性的现代阶段,现代物理学、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都有一种对非西方文化灵犀相通的情怀。”^① 对于现代性前后期的区别,人们都已注意到两个关节点,即启蒙理性和现代主义文化,所以有人也将不同阶段的现代性分别命名为“启蒙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②,“前期现代性也可以不那么严格地界定为启蒙的现代性。……尽管在早期现代性中已经出现了对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或张力,可以从历时的角度看作是前后期现代性之间的历史转变,是后期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所谓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对前期现代性的否定。”^③

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本身既已显示出其内涵的丰富与复杂,特别是现代性诸种价值之间既有同源性,也存在冲突与对抗。共识地考察现代性的结构与内涵,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涵盖了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各个知识与价值领域,它还直接构成了历史现实本身。从词源学角度来看,英语中的 modern 一词直接来源于法语中的 moderne 和意大利语中的 modernus,词根则源于拉丁语 modo,意思是“现在”和“当下”。可见,“现代”一词首先是与“传统”、“过去”相对的。“现代一词的这种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含义到十六世纪开始流行,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和现代性(modernity)随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被广泛运用。”^④ 这种“现代”意识一经产生,随即便设置起了一系列的二项对立:进步/保守、传统/现代、新/旧……对未来新社会的信仰和对历史总体性目

① 张法《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方面》,《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1991, p. 86 - 87.

③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④ 《汪晖自选集》。

标的期待使现代性成为一种重构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自我关系的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标尺。经过这一重构过程，一种迥异于原始的、神话的循环时间观的新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感知历史流动的统一方式，即时间不再是无限循环、周而复始的，而是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并且“黄金世界”将会产生于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这种历时进化与历史目的论正是所谓“现代人”的一种普遍信仰。所以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的词汇》一书中，在 modern 一词之后又附上三个相关词，即 improve（改进、完善）、progress（进步）、tradition（传统）。这种比照正是“提示了把握现代一词的正确途径：现代不仅意味着比过去更好，而且它就是通过与过去（传统）的对立或分离来确定自身的，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建立在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之上。”^①如果进一步地从哲学上考察，“现代性”理念的形成与笛卡儿特别是康德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笛卡儿引发了西方哲学的近代转折，特别是由自然哲学的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此，哲学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过去的宇宙始基问题，而是转向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我思故我在”这一笛卡儿主义的核心命题首次确立了主体的人的地位，理性、自我成为独立的人的标志。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观念也从此被奠定下来。由于笛卡儿将“我思故我在”中的“我”界定为理性反思的主体，所以笛卡儿哲学也成为反思哲学的开端。“他的论证是‘我思故我在’。‘我’就是‘理性’、‘主体’，其基础和功能就是‘反思’。主体在反思活动中产生了理性直觉和天赋观念，由此通过理性演绎法就能构造出整个知识体系来。”^②可见，笛卡儿哲学不仅为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体确立了独立的地位，而且

① 《汪晖自选集》。

② 余英时《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5 月版。

导引出现代性知识结构的未来可能性。到了康德那里,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建构获得一次完整而深刻的总结。康德的批判哲学界分了知识领域中的科学、伦理与审美,知情意三个不同向度构成了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新模式,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实验科学、独立艺术以及道德和法律理论按相应的原则建立起来,文化—价值领域得以形成——而这就使知识过程可能与理论问题、审美问题及道德—实践问题各自的内在逻辑取得一致。”^①此外,康德关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二分(即“规定的判断”与“反思的判断”)、关于历史进步的最终指向的复杂辨析、关于人的启蒙理性的高扬、人的认知、实践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康德哲学本身固有的矛盾与双重性,都成为现代性理论包括后世现代性反思的思想资源。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现代性,上述理性化、合理化等内涵表现为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经济模式的世俗化和专业化,现实理性、科技理性取代传统信仰与神圣价值,而精神—审美的自律也得以成为可能。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正是在这一层面阐释现代性的重要理论。“韦伯认为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把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三个自由的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它们之所以有所分别是因为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一贯世界观完全崩溃。自十八世纪以降,旧有世界观所遗留下的问题被整理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分别是真理、正义、真实和美。这些有效性可以被视为知识问题、正义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来理解。因此科学的论述、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批评和创造都随之而正规化起来。……这种对文化传统的专业处理,带出了专业层面上的内在结构。于是产生了认知—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等三个

^① See Jue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1.

结构。”^① 像康德哲学一样，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一次知识学上的整合，同时也蕴含或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理论中的两大构成——现代化理论和批判理论都可追溯到韦伯那里。比如韦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霸权、官僚体系“铁笼”的反省，正是后来“西马”展开启蒙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源头。从这里也可以再次见出现代性话语的复杂面目。它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精神，而且可以说现代性一经生成，就持续进行着一场充满内在张力的演化活动，这种演化既有赖于现代性在历史实践层面的高歌猛进，也离不开文化精神层面的反复质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性的呈现方式可以有所侧重（如前期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现代性的相对和谐），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现代性价值也可能会显示出不同取向与色彩，即使在同一个言说主体那里，现代性的多面与矛盾也往往会一并呈现，这一切都提示我们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必须对阐释视角和阐释语境保持充分的自觉。

二、作为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论域中，所谓历史是某种话语活动的产物，也即历史的阐释不妨直接视为历史本身。至少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的叙事性与虚构性被极大地凸现出来：“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② “后来

① 《汪晖自选集》第5页。

② 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做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① 实际上,历史本文建构的想象与虚构不仅仅体现在对“过去”的描述中,而且常常见诸对现实与未来图景的解说与认定之中,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凡此种种都可视为某种“历史”想象。现代性话语自然也可视作一种有关“历史”的叙事,而且,对人类近现代社会而言,这一历史叙事背后所蕴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现代性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或“本文”所获得的历史性(即产生的历史影响及其直接的历史化过程),又是其他历史叙事所难以企及的。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叙事”,它确立起的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与循环的、轮回的、神话式的时间意识正相反。对此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曾引述哈贝马斯的有关论述进行阐发:“……现代性概念则表达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现在就是一个持续的更新过程。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等至今仍然流行的关键词一方面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现代性不再能从别的时代获取标准,而只能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② 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把我们的历史实践与精神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归入这一现代性时间轨

① 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汪晖自选集》。

道之中。新的时间叙事更改了我们固有的意义系统,实际上也就是重构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现代性进入中国社会之初,也正是以这种崭新的同时也是异质的时间意识改变了汉文化的某些观念。现代性在中国近代发生之际,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从时间观念上看,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六十年一轮回的时间纪元方式正面临公元西历纪年的挑战,而且最终被后者取代,这也正是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较早的具体改变。这种改变虽貌似历史细节问题,但正如前面所述,时间叙事可以改换意义系统与价值模式,因此本文中将要涉及的一些命题,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小说”等等,其实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新”的时间观与历史意识,也就是说都是背靠某种“现代性”观念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也正是以这种现代性时间叙事作为一个重要支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干支纪年方式似乎是传统的时间话语最后的言说了,它们所标识出的“变法”、“革命”、“战争”这些历史事件,反过来正好最终消解了这种传统时间意识自身,在西方,辛亥革命就是被称作“1911年革命”。从这里也可见出,汉语中的现代性虽然也受到中国文化固有因子变异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产物。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现代性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策略与价值指归。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更是文艺复兴以来历史演进与历史叙述的“元话语”。当我们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是启蒙主义的产物时,实际上也正是指出了现代性的核心话语——启蒙传统对西方这一段历史的塑造之功,换言之,现代性的叙事话语(启蒙是一大题旨)与历史演进本身正是这样一种相互指涉与相互建构的关系,质言之,语言与历史在这里一再发生着一种相互生成的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语言构筑起的历史大厦和历史

演生出来的语言神话一方面彼此支撑,同时也会在历史场景的边缘和语言表述的缝隙中不断透露出一些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历史真相,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现代性历史叙事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和复杂的历史功能进行必要的分析。

现代性的叙事法则直接建立在前述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正因为时代有新旧之分,历史有进步与保守之别,而意义与价值又存在于未来的自由与解放当中,所以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自觉地与时代同步,向未来看齐。扩而言之,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群落(无分民族、国家与地域、传统)也都被认为应该接受这种“现代”精神的感召,将自身汇入现代性价值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这样,从日常生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都将维系在与现代性的关联之中。西方文明也正是以此逻辑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正是这样一种叙事。启蒙主义思想在瓦解中世纪神学统治的同时,的确又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新神话。主体的人无论在上帝面前还是在自然面前都不再是一个甘受支配、一意顺从、简单模仿与映现外在世界的一种存在,而是自身成为一种新的支配者角色。主体的人的自信源于理性,理性之于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理性主体使人一跃而变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主宰”,知识与理性之光不但使人穿越了一个昔日的黑暗隧道,而且将照亮人类的前程——启蒙主义庄严许诺给我们一个不断进步、最终解放的未来世界。启蒙现代性预设了一系列双项对立的范畴:光明/黑暗、理性/愚昧、科学/宗教、进步/落后……其中,自由、解放、平等、民主、知识与自主性等成为启蒙坚执的信条。这一套启蒙话语作为一个“非凡的智性努力”和人类解放的宏大“方案”(哈贝马斯语),自然具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也一再获取着新的合法性(如在中国语境中,这一合法性虽同样遭受质疑但显然未失其牢固的现实土壤和历史必然性)。然而,启蒙方案本身也

难掩其历史叙事的色彩,而且这一“方案”与启蒙的历史实践之间也的确存在有目共睹的差异和距离。在今天仍不乏执著地捍卫启蒙现代性的声音,而且这种为启蒙辩护的呼声在某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如中国现代社会)又显得意义特别,但现代性叙事本身固有的矛盾、启蒙话语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区别以及启蒙现代性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观念模式也同样是难以回避的,仅仅为启蒙合法性做辩护也许并不能真正直面这些问题,而相关的反思无论对捍卫现代性还是质疑现代性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考虑到现代性叙事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强势影响,这种反思在本文语境中同样将是一个反复展开的必要工作。

西方学者对启蒙现代性的“重新书写”或某种辩护可从福柯、利奥塔以及哈贝马斯等人那里见出大概。当然在早期的西马人物(阿多诺、霍克海姆)以及更早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韦伯社会学思想中均可见出对启蒙的辩证批判。“韦伯通过揭示理性的分裂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难以通约和相互敌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批判了现代性的根本;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则把法西斯纳粹制度的起源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在历史领域反思哲学问题,把启蒙的辩证法呈现为一个理性、主体日渐神话化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变成非理性、启蒙走向蒙昧;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解构政治学用来揭示启蒙计划背后的权力关系尤为适宜,以‘反现代’为宗旨的‘后现代’理论(如利奥塔)则从质疑启蒙叙事入手质疑一切现代知识形式及其法则,现代性危机被明确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而激进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更直言启蒙的文化侵略内涵,启蒙计划被逻辑地理解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确认,启蒙知识分子成为其文化控制的工具和通道,重建本土文化的价值和尊严则近乎必然的选择。在这一图景中,诸如理性、主体、知识、进步等观念不再是启蒙殿堂巍然耸立的柱石,而作为现代化不良后果的原因频频受

到拷问;被撤去了界标和柱石的现代性不再是具有诱惑性的知识前景,而成为可资争论的思想遗产。”^①实际上,这种“可资争论”的性质正表明了这一复杂精神传统极强的可阐释性,而且,在质疑现代性叙事的声音里,有不少人(如“西马”)也正是依循启蒙理性的原则反思启蒙主义本身的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对异化、阶级等的一系列分析也包含着自己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念。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本身便被后人引申为现代性中的两大向度——批判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可见,启蒙现代性一方面引发了一场自欧洲到世界范围内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活动,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人对这一历史过程乃至现代性价值本身的一再怀疑。这种内在紧张也许正是时至今日启蒙现代性虽遭解构却仍具理论生机的一大原因。由启蒙主义开启的一段现代历史果真终结了吗?现代性营造的“宏大叙事”果真能彻底消解于话语分析之中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所谓“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他将作为一个有待完成的“方案”的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实际历史过程加以区分,指出现代化历史实践并未真正体现或实现现代性理念,而启蒙现代性本身自有其特定价值,促使这一伟大“方案”的最终完成应是一个仍显必要的历史使命。这里,哈贝马斯强调的是现代性方案与现代性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异,虽然有将前者“理想化”之嫌,但反对将语言与历史直接对应起来的立场也的确有可取之处。在哈贝马斯看来,既然历史叙事并不等同于历史过程本身,所以无论在这一叙事内部有怎样的冲突与紧张,都不应该自动地放弃将之加以某种历史化的可能。现代性传统作为叙事也好,“方案”也罢,其历史价值仍是有待完整实现的。在我们看来,围绕现代性传统的争论至

^① 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7月。